

努力实现抑通胀和稳增长双重目标

□ 郑新立



戴明正 摄影

2011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三个明显特点:一是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态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2%,虽然比2010年10.6%的增速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快速增长的范围,符合以抑制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的要求。二是三大需求均衡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17.1%、23.8%和20.3%,均处于正常旺盛增长态势。特别是消费持续旺盛和民间投资增速逐月加快,并明显快于国有单位投资,自主增长机制的作用正在增强。三是通

胀的压力依然较大。尽管从2011年9月居民消费价格开始下降,但全年仍比上年增长5.4%。在这一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一、继续稳定物价总水平

2010年下半年以来,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构成2011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这一轮价格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成本推动性和输入性特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和城镇住房价格上涨是主要诱因。

食品价格的上涨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蔬菜和肉类是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2011年上半年猪肉价格上涨拉动CPI1/4,1—10月份拉动CPI1/5。二是周期性特点非常明显。2011年猪肉价格高涨,是因为两年前的猪肉价格太低了,而两年前的猪肉价格太低又是因为四年前的价格太高。所以对于食品价格的上涨,用收紧银根的办法达不到调控的目标,正确的办法是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通胀,特别是实现生产和需求之间的衔接。具体来讲,一方面,应发展现代农业,培养集约化的生产者,通过供求合同来稳定生产、稳定价格。另一方面,应逐步提高大中型城市的自给率。据统计,目前我国城市的蔬菜供给70%左右靠长途运输,长途运输的运费、油费、过路过桥费抬高了价格,造成了农民、经销商、消费者三方利益受损的无效率局面。20世纪90年代,为了抑制通胀,提出“菜蓝子工程市长负责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对解决那时的通胀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现在不光要搞“菜蓝子工程”,还要搞“菜园子工程”,将大中型城市的蔬菜自给率提高到60—70%。

调控住房价格,应强化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责

任。一是要增加住房的供给，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地方政府应积极增加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给。如果在“十二五”期间能够顺利完成建设四千万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城市住房的价格就可以稳定下来。二是要对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工作进行问责。统计局可以公布城市住房价格指数，如果这个城市的住房价格过高，老百姓可以问责。例如重庆市提出了一个标准——房价收入比，明确这个比例应保持在6以内，即一套普通住宅的售价大体是城市户均年收入的6倍。

二、发挥财政、货币政策促进调整的作用

当前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采取结构性的优化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而不应过多采用收紧银根的办法。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把资金冻结起来，不但会制约中小企业的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还容易引发高利贷的活跃。应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发挥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通过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减税等措施，把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具体来说，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 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企业资金来源主要靠银行贷款。发达国家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一般为7：3，而我国目前是3：7，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直接融资的潜力巨大。应抓紧完善规范透明的资本市场，发展各类基金等合格机构投资者，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选企业、价值发现和财富分配功能，尽快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2.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关键是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应通过优先提供贷款、优先发行企业债券和在股票市场上市等措施，鼓励资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骨干企业集聚，尽快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

3.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投入大量资金加快建设。应积极推广特许经营权等行之有效的办法，把社会资金吸引到这些领域。比如，城市轨道交通和立体停车场社会需求巨大，应允许企业投资建设和自主经营。鼓励发展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托儿所、民办养老院，以满足社会多层次的需求。

4.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已经严重制约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制约就业规模的扩大。应加快生产性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并尽快推广。同时，落实提高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政策，为服务业发展和群众性创业活动提供良好环境。

5. 农业现代化。目前，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一是社会资金充裕。二是劳动力转移有出路。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持续上涨，目前已达到月均2000元以上。三是城市对优质绿色的农产品需求旺盛。引导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还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首先，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问题，保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其次，可以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使其尽快致富，实现小康。再次，土地转包可以提高农业的

规模经营水平，发展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农业收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三、扩大海外投资，变部分外汇储备为物质储备

我国外汇储备较多，且仍不断增加，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外资涌入，迫使央行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加大了通胀压力。美联储连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借助美元贬值向国外转移危机负担，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使我国大宗进口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带来了输入性通胀。美元贬值又导致我国外汇储备缩水，威胁着我国外汇资产的安全。应通过海外投资，把一部分外汇储备变成能源资源储备和物质储备，化解外汇储备过大的压力和风险。并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

第一，获得能源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解决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瓶颈。我国煤炭资源比较多，石油、天然气比较少，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获得更多的油气资源。另外，我国铁矿、铝矿、铜矿比较少，而经济长远发展对这些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要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的供应渠道，掌握价格主动权。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类型的企业应相互配合，大企业和小企业都要“走出去”。现在大企业“走出去”，往往被看成股权基金，国外非常警惕，小企业机动灵活，大企业办不成的事小企业可以办，小企业拿到能源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之后，可以与资金和技术实力较强的大企业联合开发。同时，政府应加大贷款援助力度，修建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企业将资源运回国或者就地加

工成粗产品运回国提供条件。

第二，国际并购，引智创新。世界经济遭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之后，美国、欧洲、日本有很多拥有很好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和技术储备的企业，因市场需求不足而经营困难，濒临倒闭。我们应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并购国外科技型企业，迅速提升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发展加工贸易。现在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困难，对我国产品的进口在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我们只有通过到海外投资，特别是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创造需求。目前我国的汽车、家电、纺织企业都已经具备了海外生产制造的能力，通过到海外投资，不仅可以带动我国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还能够帮助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缓和贸易摩擦。

第四，发展工程承包和劳务承包。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劳务输出。完善外汇使用体制，提高对外承包工程和企业融资能力，建议政策性银行对实力强、信誉高、业绩好的企业和项目扩大授信额度。另外，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入大、工期长，风险较高，易受不可预见的外来因素如自然灾害、战争等影响，应加大政策性的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力度。

四、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但是由于2011年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实际上在宏观调控中把抑制通胀放在了突出的地位。2012年通货膨胀压力逐步下降，应及时地把宏观政策的重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才能够既抑制通胀，保持价格的稳定，又保证近期和远期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第一，调整需求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率，实现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达到48.6%，全社会生产的产品有将近一半用来扩大再生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只有33.8%，政府消费率是14%，第一次出现最终消费率低于投资率。投资率过高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现在是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过几年之后可能就是基础设施过剩，而出口增长又是造成现阶段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主要因素。因此，投资率过高成为当前宏观经济结构中最大的扭曲，必须逐步提高居民消费率，扭转消费、投资结构失衡的局面。提高居民消费率关键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收入，通过发展现代化农业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第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中央提出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各级政府和企业加大研发的投入，科技成果已经开始涌现。2009年，美国申请的国际专利是5万项，我国是8千项，美国是我国的6倍；2010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略有下降，我国增长了30%以上，美国跟我国的比例已经下降到3.6：1。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2015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就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在这一方面，要改革教育体制、科研体制、人才选拔培养机制等，形成鼓励自主创新的环境和氛围。还要着重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现在我们的专利申

请量有68%来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力军，下一步，应建立体制机制，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方面的骨干和带动作用以及其在各个行业前沿的技术优势，将国有企业培养成为创新的主力部队。

第三，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34%，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差距悬殊，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还要低十来个百分点。我国服务业比重低，税收体制不合理是重要的症结。工业实行增值税，服务业实行营业税，营业税税负比增值税税负重。现在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将降低第三产业税收负担，对于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近期出台的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也将降低小企业税负。这些政策对于鼓励和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抓紧试点，总结经验，尽快推广。

第四，改革金融体制。长期以来，得不到贷款支持是制约小企业、个体户发展的最大瓶颈。得不到贷款的小企业主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这也引发了更多更大的问题。因此，应放宽市场准入，通过健全地方的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等举措，实行利率市场化，推动银行中长期贷款的证券化，同时，改革外汇使用的管理体制等，配套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促进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从而推动第二产业的改革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的演讲整理）

责任编辑 张蕊